

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

李 涛 编著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 / 李涛编著.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1

ISBN 7 - 5073 - 0677 - 1

I. 在… II. 李… III. 张闻天 - 生平事迹 - 1935 ~ 1938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6175 号

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

编 著 / 李 涛

责任编辑 / 吴少京

封面设计 / 李法明

版式设计 / 郑 刚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销售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民文排版中心

印 刷 / 北京安泰印刷厂

装 订 / 广 增装订 1

850 × 1168mm 32 开 14 印张 34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ISBN 7 - 5073 - 0677 - 1 / K · 293 定价: 26.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张闻天在全党负总责，实际上相当于担任党的总书记。只不过当时已经不再设“总书记”这个职位，但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还是称呼总负责人为“总书记”。

张闻天在全党“负总责”的时间，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只有三年多的时间，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是微不足道的一瞬间，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则是不同寻常的。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失败走向胜利。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西北一隅走向了全中国。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

总之，就是在这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年走向了成熟。

在叙说张闻天这段历史时，本书贯穿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试图说明他对中国革命所做的历史性贡献。

本书共计十一章，其中首章以张闻天“参加临时中央的核心领导”开篇，最后一章以他“离开中央书记处”结束。

为了更好地再现张闻天的这段历史及其贡献，笔者在时间上向前做了必要的追溯，向后进行了适当的延伸。张闻天在这一时期所做的贡献，离不开他的思想转变。于是，就有了以“从第三次‘左’倾分化出来”为第一章，这也就是所谓向前必要的追溯。张闻天同毛泽东领导职务的交接是有一个过程的，这在最后一章“主管宣传教育”里进行了交代。于是，也就有了所谓向

后适当的延伸。

这一时期的党内斗争是极为尖锐和复杂的，主要是进行了三次大的较量。第一次是反对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第二次是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做斗争，第三次是抵制王明的新投降主义。对于这些斗争分别以“遵义会议前后”、“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抵制王明右倾投降”为章做了说明。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在这些方面张闻天都有重要的建树。为此，本书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两章中分别对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进行了论述。在军事方面，本书没有单独作为一章来写，而是把它放到“遵义会议前后”、“抵制王明右倾”等章节中了。其实，张闻天在军事上的贡献也很大。例如，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他提出：“红军政治工作要保证党的路线的执行”。又如，在瓦解敌军上，提出了“对争取东北军工作的一些意见”。再如，在战略方针上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等等。

初到陕北，百废待兴，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时，张闻天呕心沥血，做了全面的部署。“安家陕北”一章对此作了详细的介绍。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闻天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自始至终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其真实的写照。

白区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张闻天在党中央分管白区工作，他坐镇陕北，指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工作。《恢复白区工作》展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工

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土地问题，不正确

地解决农民及其土地问题,就将一事无成。《转变土地政策》,记录了张闻天在这方面的成就。

张闻天之所以能够作出这些贡献,决非偶然。这不仅在于他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在于他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郭沫若曾在一封信中说过:“古人云‘国尔忘家,公尔忘私’,是为道德之最高标准。中国革命深幸有如洛甫先生兄弟者多也,故得庆成功。”当年郭老信中“国尔忘家,公尔忘私”,难道不正是张闻天一生品德的最好写照吗?

在撰写本书时,笔者参考了许多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也参考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成果。在此一并致谢,恕不一一列举。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佟英明老师从选题到结构上,都提出了根本性的指导意见。借此之机,笔者予以说明,并对他表示深深的敬意。

作者

1999年1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	(1)
一、参加临时中央的核心领导	
二、冲破“左”的禁锢	
三、“博洛矛盾”	
四、“毛洛合作”	
五、准备长征	
第二章 遵义会议前后	(37)
一、中央队里“三人团”	
二、停止李德的指挥权	
三、遵义会议上的“反报告”	
四、在党中央“负总责”	
五、系统阐述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	
六、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七、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第三章 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	(72)
一、主张北上,反对南下	
二、坚持原则,适当让步	

- 三、危急时刻，断然北上
- 四、维护团结，反对分裂
- 五、力阻西进，会师陕北
- 六、清算张国焘路线错误
- 七、撰写《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

第四章 安家陕北 (113)

- 一、喜从天降找到了落脚点
- 二、“刀下留人”——为刘志丹平反
- 三、喜结良缘——同刘英结婚
- 四、积极行动——“打通国际路线”
- 五、主持瓦窑堡会议——参与确定新政策
- 六、东征西征——巩固扩大根据地
- 七、会见斯诺——宣传党的对外政策

第五章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54)

- 一、努力建立统一战线
- 二、反对“关门主义”
- 三、参与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 四、全面论述统一战线理论
- 五、参与制定各项统战政策
- 六、成立“青年救国会”
- 七、实行“逼蒋抗日”
- 八、联合地方实力派
- 九、指导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

第六章 转变土地政策 (204)

- 一、参加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 二、转变土地政策的内因
- 三、揭开土地政策转变的序幕
- 四、“改变对富农的策略”
- 五、“土地革命要适合于民族革命”
- 六、实行减租减息

第七章 恢复白区工作 (233)

- 一、转变白区工作的开始
- 二、派刘少奇前往北方局
- 三、指导上海地下党的工作
- 四、改变白区工作策略
- 五、促使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形成
- 六、“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由来
- 七、召开白区工作会议
- 八、培训白区工作干部

第八章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66)

- 一、独到见解——“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 二、和平调解——“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
- 三、审时度势——独立自主作出决策
- 四、多方努力——确保西北“三位一体”
- 五、西安之行——“愿为和平继续奋斗”
- 六、团结御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第九章 加强党的建设 (299)

- 一、摆脱教条主义建党模式

- 二、初步总结党的建设经验
- 三、进一步探讨党的建设理论
- 四、全面论述党的组织建设
- 五、纵论青年修养
- 六、撰写党建文章

第十章 抵制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340)

- 一、警惕右倾投降主义的危险
- 二、“十二月会议”上的较量
- 三、“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再较量
- 四、“三月政治局会议”后的斗争
- 五、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

第十一章 主管党的宣传教育工作 (376)

- 一、转变领导职责
- 二、兼任马列学院院长
- 三、领导编译马列著作
- 四、编写革命史教材
- 五、拟定宣传提纲
- 六、宣传文化政策
- 七、总结干部教育经验
- 八、离开中央书记处

第一篇 从第三次“左倾” 路线分化出来

张闻天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在党内曾经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闻天虽然没有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但从1931年党的四中全会以后曾经是“左”倾中央的领导人，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推行过王明“左”倾路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张闻天不是一个完人，但他却是一个伟人。与其他同犯“左”倾错误的人相比，张闻天觉悟得早，摆脱得快，改得彻底。对此，毛泽东、周恩来都曾给予肯定。

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人”期间，毛泽东曾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还说，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为此，毛泽东要人们绝不要忘记他们。1960年7月16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会议时也说过，那个时候，开始是张闻天转得快，王稼祥先转了，张闻天也先转了。他们都对张闻天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张闻天后来能够摒弃“左”倾冒险主义，转变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是确有一个转变过程的。但是，这个转变决不是偶然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师哲说过：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还有他本身的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都有哪些呢?归结起来主要是:努力加深对中国革命实际的了解,是摆脱“左”倾错误的前提条件;努力在实践中检验,是他摆脱“左”倾错误的重要因素;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是他摆脱“左”倾错误的理论条件;立党为公,光明磊落,是他从“左”倾错误中摆脱出来的内在品质。

一、参加临时中央的核心领导

张闻天,上海南汇人,早年在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至1923年,先后赴日本、美国学习和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苏联学习,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当时俄文化名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伊恩美洛夫,别名清甫由此而来)。1931年1月,张闻天结束了整整五年留学苏联的生活,与杨尚昆结伴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他同杨尚昆一道,历尽艰辛,终于在2月17日到达了阔别已久的上海。到达上海的那天,恰巧是辛未年的大年初一。不久,张闻天、杨尚昆就通过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学陈昌浩与博古联系上了,随后,也就开始了张闻天与博古的长期合作。

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已经开始了在全党的统治。经过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植下,王明等人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为旗号,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左”的训令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更加“左”的错误观点,并在组织上取得了党中央合法的领导权。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上是向忠发,他对王明是言听计从,所以党中央实际权力控制在王明手中,为王明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创造了重要条件。

此外,当时中共的党内斗争十分激烈,白色恐怖也异常严重。党的四中全会将瞿秋白等以“调和路线错误”的罪名排除在中央领导之外,而反对四中全会的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走上了分裂党的道路,有的被开除出党,有的被逐出领导机构。另一批反对四中全会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等党的重要干部,则由于叛徒唐虞的密告于1月17日被捕,2月7日在龙华英勇就义。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已经决定以开展“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为名,向各地派出一批干部。在这种情况下,难怪博古与张闻天、杨尚昆一见面,就十分高兴地连声说:“欢迎,欢迎!目前党很需要‘理论干部’,也很需要‘斗争干部’。”

在此之前的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张闻天的好友、也是他的人党介绍人、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去鄂豫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因此,这时张闻天从国外回来了,正好填补了中央宣传部长这个空缺。当然,张闻天对此并不感到突然,他认为这正是自己充分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因而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了工作中去。

从1931年3月2日起,张闻天开始以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接着他又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和苏区委员会负责人。张闻天上任以后,主编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红旗周报》,撰写文章,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张闻天工作勤奋,文思敏捷,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在《红旗周报》等党的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分析政治形势,揭露帝国主义,抨击南京政府,指导党的工作。

就在张闻天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时,党中央机关出了大事。4月下旬,中共中央分管保卫工作、掌握中央大量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并向国民党特务机

关键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机关头，这一绝密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所获悉。他即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向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克农立即转报党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的协助下，采取了断然措施，保卫了党中央安全，避免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张闻天从容不迫地坚持斗争。他负责的《红旗周报》，到5月25日就又继续出版了。党中央同共产国际通讯的秘密电台，本来是由特科掌握的，顾顺章叛变后也改由张闻天掌管。

在顾顺章叛变后紧张的日子里，张闻天奋笔疾书，一刻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从4月到6月中旬，他经过深入研究，写下了两篇驳斥取消派的长文，《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取消取消派》——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和《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甘的〈中国经济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战线上战胜托陈取消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在1931年5月下旬恢复正常工作之后不到一个月，6月22日又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王明成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上海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连续遭到国民党的破坏。7月25日，杨匏安等23人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当时蒋介石曾悬赏500元大洋捉拿王明。这时的王明深感中国终非久留之地，随时可能被捕，不如找个机会，远走高飞。正巧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瞿秋白被赶下台，代表团团长的职位一直空缺，王明在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准备前往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

王明走后，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屯、李竹主、康生、陈云等，在上海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负总责。张闻天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走上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的。

临时中央成立后的分工是：党的决议主要由博古写，张闻天则根据决议与文章进行宣传。这时，张闻天写的文章很多，其中当然有其比较正确和积极的方面，这就是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党发动群众开展反日反蒋斗争，分析各国的态度，教令人们抛弃对“国联”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注意总结群众斗争经验，要求全党尽量利用公开活动，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

但应当指出的是，张闻天同整个临时中央一起，是按照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进攻”路线和具体指示来观察形势，并制定战略和策略的，是按照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来开展工作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张闻天竭尽全力地写文章宣传、鼓动、贯彻集中力量打击中间派别和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等“左”倾观点，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在临时中央，张闻天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两个主要的方面：

一个主要方面是照搬照抄斯大林的公式，把中间派别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采取揭露、打击的方针。张闻天1931年10月26日写的《满洲事变中各个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一文，可以说是这种“左”倾错误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方面笼统地认为国民党内各个派别主张召开“和平会议”、成立“统一政府”，不过是为了“用这种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来团结他们的内部、以镇压革命。”另一方面，张闻天又对国内其他各种政治派别，如“国家主义派”、“新月派”、“社会与教育派”、“托陈取消派”等及其代表人物逐个点名予以严厉批评，一律说成是

“反革命的在野派”，说他们的对日“宣战”与成立“国防政府”的主张，“实际不是为了对付日本，而是为了对付革命民众”，是“为了欺骗民众，来维持中国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另一个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张闻天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重复共产国际对于革命形势的过高估计，执行“反右倾”的错误方针，严厉批评以至无情打击党内对于“左”倾观点持不同意见的组织和个人。其中1932年4月初以社论形式发表的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可以说是表现这方面错误的集大成者。这篇文章认为：革命斗争“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走向崩溃，使中国革命危机更加成熟”，因而应该采取“进攻”路线，“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

此外，张闻天在文章中对几乎所有的部门、省区都进行了点名批评，而在对各苏区的批评中，中央苏区又首当其冲。在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被斥之为“等待主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被说成有“农民苏维埃”的倾向。应当指出，张闻天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曾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当然，这些宣传、贯彻“左”倾错误的文章的写作和发表不权仅是他个人的意志。文章的主要观点来自共产国际，也来自临时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作出的决议或发出的指示，其中有些观点甚至是张闻天本人都不赞成的。但必须看到，张闻天执行“左”倾路线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就张闻天犯“左”倾错误的主观原因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他过分盲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从政治上到思想上都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二是由于他长期在国外学习，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后来又在上海临

时中央工作，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这使他很容易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对中国革命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

还应当指出，张闻天毕竟不同于王明，也有别于博古。在1932年10月和11月，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0期和第31期上，先后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文章。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我们的队伍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表现在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张闻天认为“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接着，他明确地指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对于他们的任务，不是排斥，不是谩骂，而是耐心地解释、说服与争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张闻天的这篇文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于张闻天的批评，文艺战线的几位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等立即诚恳地表示接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文委书记的冯雪峰与瞿秋白商议，请瞿秋白起草了《并非浪费的争论》。11月26日，冯雪峰写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在这些文章中，他们承认左翼的批评家往往不是犯着机械论的错误，就是犯着“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并提出要纠正个别同志“指敌为友”的失误。1932年12月，鲁迅发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就是同张闻天批评关门主义的步调一致的。

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张闻天明确提出了“党八股”的概念，对在“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下的宣传工作进行了评

击。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宣传“往往是死板，千篇一律的、笼统武断的。我们在这一方面缺乏具体性、时间性、缺乏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的工作。我们同志在这一方面的特点，就是‘党八股’（又名‘十八套’）。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话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为止。我们不管群众是否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都必须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来，方才痛快。像这样的宣传鼓动，当然没有法子动员广大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正确的做法是：“要能动员广大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首先必须提出群众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迫切要求，抓住这些具体要求来动员群众参加斗争。”

从以上不难发现，由于“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使张闻天逐渐醒悟，他要极力摆脱“左”倾错误的束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10月27日，临时中央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张闻天将“左”倾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他指出，“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后，的确值得我们注意的。”在作“结论”时，张闻天又进一步指出：“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容易发生的，”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将临时中央自身工作中的错误，作为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提了出来，这在张闻天之前还没有过。

所有这些，也就预示着张闻天终究要同“左”倾错误分道扬镳！

二、冲破“左”的禁锢

1932年底，张闻天离开上海“临时中央”，绕道前头于1933